

土耳其强势崛起对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

丁 工

内容提要 中东变革以来，土耳其凭借良好的发展态势、独特的区位优势、有利的国际环境，活跃于地区外交的多个舞台，借剧变之机崛起上位为地区舞台的一线主角，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在地区事务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局面，呈现颠覆传统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版图的态势。土耳其的强势崛起导致国内战略取向态度、地区格局重组的发展进程产生变化，同时也提升其民主模式的地区影响力。尽管土耳其成为中东变局的重要赢家，但崛起道路依然存在制约因素，需要在充分把握机遇的基础上，有效应对困难与挑战。

关键词 地缘政治 中东转型 土耳其模式 叙利亚危机

作者简介 丁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732）。

中东变局爆发以来，土耳其的风采格外引人注目，从鲜明支持埃及民众运动，致力更迭利比亚政权，到充当倒叙急先锋和反巴（巴沙尔）大本营，再到推动、承担伊核问题七方会谈，使“高烧不退”的伊核危机一度展现出缓解降温的迹象。随着身影频繁活跃于动荡区域中的多个外交舞台，土耳其的国际地位日益凸显，迅速蹿红为国际媒体竞相报道刊登的“明星热词”。面对土耳其近期强劲飙升的名望声誉，人们不禁要问土耳其的底气何来，缘何能够在地区多国普遍陷入动荡之际逆势上扬，借机强势崛起。本文从主、客观两个角度对土耳其在变局中实现地区崛起的依据和原因进行解读，并对土耳其崛起后对地区格局的影响成效进行分析和展望。

* 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特向该文的审稿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以下简称“正发党”）接管政权后，土耳其政府面对债台高筑、经济滞缓、社会问题成堆的不利局面，果断作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战略决策，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和强力度对外开放市场的政策举措。随后，土耳其经济开始企稳向好并快速增长，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经济总量也由该党执政初期的250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8000亿美元，国力的持续增强成为土耳其繁荣、稳定、富饶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制定了一套可以巩固国际关系、平衡国际利益的对外政策，即在以面向西方欧美国家为基石和主轴的外交布局不动摇前提下，显著提升对周边事务的参与程度和话语权重，日渐呈现东进、南下、北和的战略趋向。在东进战略方向上，利用与中亚突厥语系国家在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和地缘方面的联系，以血缘关系打头、经济援助断后的方式，进一步密切与突厥语族的关系；在南下战略方向上积极发展同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与伊朗、叙利亚等有矛盾的邻国实现部分和解，在伊拉克问题上，主张维护伊统一和领土完整，积极参与战后重建并推动伊国内教派和解；在北部黑海方向缓和与俄罗斯等国的紧张局势，加强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对巴尔干、高加索等曾经有传统影响力的地区，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突出地区大国的重要性。2011年初中东变局所引发持续至今的新一轮地区力量变换重组，客观上给土耳其扩展外交活动空间、扮演地区强国角色提供了新的契机和舞台，并恰好与其所倡导的战略东向外交相匹配。因此，土耳其能够在中东变局中实现地区层面的崛起绝非偶然，是主观的政策转向调整和客观的国情条件变化、国际局势发展等多方因素相互促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土耳其强势崛起的资源依托

土耳其能够在中东变局中实现地区层面的崛起，获得国际社会对其作为独立区域力量的认可，主要建立在国力资源、地缘资源、精神资源和外交资源4个层面的现实基础上。

（一）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国家实力大幅跃升

土耳其在经历了1999年和2001年两次严重经济危机后，新上台的正发党政府进行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改革，随后土耳其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总量开始止跌回升并迅猛发展，现今土耳其已成为欧洲、中东地

区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2005～2009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8%左右。当前，土耳其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17位、欧洲第6位，并稳居中东第一大经济体宝座。有研究机构预测，土耳其作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国家，^①未来有望进入世界前十位，甚至成为欧洲第四或第五经济大国，达到意大利或者法国的水平。土耳其基础产业门类较齐全，为中东地区主要的工程项目承包国和工程机械产销国，也是世界第5大造船国、第11大钢铁生产国和第15大汽车制造国。^②土耳其不仅在传统经济领域发展较快，而且在高新科技、电子产业、能源化工等方面表现不俗，在软件研发等信息技术行业几乎有赶超印度的势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土耳其成为少数几个率先走出危机影响的国家，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11.7%，在全球二十大经济体中仅次于中国（11.9%），经济恢复远超各界预期，成为新兴经济体中最闪亮耀眼的“明星”之一。土耳其经济的出色表现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被许多政经评论家喻为“安纳托利亚之虎”。此外，土耳其总人口达7470万（2012年）^③，是中东地区仅次于埃及、伊朗的第三人口大国，并且青壮年占据总人口年龄梯次结构的绝大比重。土耳其健康、高速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拉大了同相对停滞的其他中东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为进行对外行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比照中东持续动荡火爆的局势，土耳其自身所焕发出饱含生机的独特魅力也在该地区为其汇聚了相当可观的人气光环，从而在国家形象的软实力领域提升了自身的综合影响效果。

（二）优越的区位禀赋保障其占据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土耳其处于小亚细亚半岛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据欧、亚、非三洲交界，自身地跨欧、亚两洲，三面环海（黑海、地中海和爱琴海），接近里海、红海、波斯湾，辖区内狭长的土耳其海峡扼守着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数百年来，土耳其作为人员、思想、贸易流动线路的交叉点和中转站，在地缘格局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冲意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④自近代俄国崛起以来，土耳其一直是抵御俄国南下扩张的前沿阵地，俄国为获得博斯

① Lenore G. Martin, *The Futur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4, p. 51.

② 商务部网站：<http://hzs.mofcom.gov.cn/aarticle/h/ad/201002/20100206780590.html>, 2012-11-08.

③ EIU, *Country Report: Turkey*, December 2012, p. 9.

④ 杨鸿玺：《土耳其在美国欧亚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载《和平与发展》2002年第2期，第28～30页。

普鲁斯海峡的出海口，先后同土耳其进行了13次战争。19世纪时，英、法、德、奥等国充分利用土耳其的地缘优势，多次联合土耳其对俄国实行牵制。冷战期间，美国从其全球战略需要的高度评估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意义，视土耳其为美国在欧亚大陆交接处的“桥头堡”，积极拉拢其加入西方阵营，使之成为阻止苏联向南扩张的屏障和资本主义围堵社会主义的据点，同时也是美欧压制中东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和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坚固堡垒。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并未使地缘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受到削弱，土耳其的重要地位也未因冷战结束而有实质丧失。在海湾战争中，在巴尔干半岛的波黑和科索沃行动中，在高加索和中东的局部冲突中，以及在非洲索马里维和行动和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中，土耳其都积极配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发挥着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地缘战略支点作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使土耳其的战略意义再次凸显。^①土耳其横跨东西方、南北向十字路口的独特地理位置，赋予其多种民族、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多种文明既长期冲突又共同融合的特殊国家身份，使其能够同美、欧、俄等大国以及周边地区势力维持重大的利益联系，堪称衔接多边地缘政治和触动诸国关切的宝贵财富，被誉为“欧亚大陆棋局中的独特棋子”。在此轮“阿拉伯变局”中，土耳其作为最靠近风暴浪潮中心的北约国家，积极协助西方，发挥前线支援、抵近部署、边沿观察、后方运作的地缘优势，不但将自身国土营建成利比亚、叙利亚反对派的“参谋本部”，还将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变成倒戈巴沙尔政权的人员集散中心和物质输配供应通道，向世界完美诠释了其地缘战略意义的突出价值。

（三）辉煌历史铸就的强国梦想成为地区崛起的精神动力

土耳其人自强不息的强国梦想源于对奥斯曼帝国荣耀的怀念和向往，是长期历史记忆积淀的结果。自14世纪始，土耳其人的先祖以安纳托利亚高原为中心向四周扩张，鼎盛时期控制着除伊朗萨非王朝外的整个中东版图，并多次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北部震慑尚未崛起的沙皇俄国，成为称雄巴尔干、高加索等诸多地区的强大帝国。^②但17世纪后，随着西方势力的崛起以及自身国势的衰微，土耳其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到一战结束时土耳其

^① Republic of Turkey from the Free Wiki - Encyclo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Turkey>, 2012 - 11 - 15.

^② 参见姜明新：《奥斯曼帝国苏莱曼盛世简析》，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4期，第89~101页。

已完全丧失阿拉伯行省和北非行省以及部分小亚细亚的领土，在欧洲也仅存伊斯坦布尔周边一隅之地，直到1923年建立全新的共和国后，土耳其才止住国家进一步崩溃、瓦解的趋势。现今，以直接传承奥斯曼帝国衣钵者自居的土耳其人，一直以光辉的历史作为激发民族自豪感的思想源泉，将复兴延续曾经的强国地位融注为各阶层民众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① 进入21世纪，土耳其通过推进国内改革、参与全球化进程、开展多元外交等途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显著增强，追求地区强国的雄心壮志再次萌发。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以及具有生命力的战略传统决定了土耳其无法不显示其重要性。中东变局发生后，埃及、沙特等传统阿拉伯大国深陷剧变漩涡，地区影响力逐渐减弱，阿拉伯世界的势力分布格局步入新一轮调整和转换周期。阿拉伯国家的持续动荡导致地区权力中心呈现由以阿拉伯民族为中东棋局的绝对主角，向非阿拉伯的突厥人、波斯人、犹太人甚至库尔德人转移、扩散的趋势。长期占据中东核心的阿以问题相对“被边缘化”，而伊朗则由于核危机和叙利亚问题倍受孤立，地区意愿被严重压制无法全力施展，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对外行动能力，土耳其由此得以一方独大。除土耳其外，地区各方势力范围缩小所营造的有利外部环境，极大地激活了土耳其人尘封已久的丰厚历史遗产。面对中东这片曾经统治过的土地，面对曾是其臣民现今又对其充满无限仰望的阿拉伯世界，绝佳的周边形势加上持续增强的国力诱发土耳其再次对主导地区事务燃起某种强烈期待。^② 土耳其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大国抱负，通过谋求地区强国战略的贯彻实施，进一步激发起埋藏民众心底已久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从而形成一种为民众所广泛接受的崛起欲望认同。这种对回归光荣历史和重塑光明前景的自我意识萌芽，已发展成为土耳其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理想桥梁”，也成为增强国家团结凝聚的粘合剂，更成为助推地区崛起的价值基础、意志支柱与精神依托。

（四）立足广阔的外交平台，赢得丰硕的外交成果

埃尔多安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在其官方表述中有两大目标：一是不断强化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加入欧盟完成欧化（西方化）进程；

^① Mustafa Aydı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Framework and Analysis”, Ankara 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 SAM Paper, December 2004, pp. 11 - 44.

^② Mustafa Aydın, “Determinants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Framework and Traditional Inputs”,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5, No. 4, 1999.

二是在土耳其周边致力于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繁荣和友好合作的地区环境。^① 在此政策指引下，土耳其在继续保持同西方密切关系的同时，对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关系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2009年3月，希拉里升任国务卿的首次中东之行便到访土耳其。在对欧洲外交领域，土耳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2005年10月，土耳其同欧盟开启新阶段的人盟谈判，2010年7月，欧盟在协调各成员国立场的基础上在伊斯坦布尔就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问题展开政治对话，随后土耳其议会也通过了按照欧盟政治标准修改宪法的议案，标志着土耳其在历时半个多世纪后又向其欧洲梦迈进了一步。

在中东地区，土耳其外交更是硕果累累。2008年起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开始举办土耳其-阿拉伯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启了土耳其与阿拉伯联盟的全面机制化建设，从而为土耳其能够在阿拉伯剧变中以观察员身份参与阿盟会议提供了制度上的平台和程序上的铺垫。相对于海湾地区，长期以来土耳其将中东外交的主要精力投射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等邻近国家，对同属伊斯兰逊尼派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处于相对忽视、疏远的状态。但随着双方商业往来的日益紧密，土耳其积极拓展和海湾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深度合作，于2005年同海湾合作委员会签署《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2008年签署谅解备忘录，使土耳其成为海合会（GCC）外第一个获得“海湾合作委员会战略伙伴关系”头衔的国家，双方还于2009年7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首次土耳其-海合会战略地位对话。

在安全方面，土耳其向海合会重要成员科威特提供军备并帮助训练军事人员，2010年5月还同沙特签订军事合作协议。土耳其借助海合会的平台，不但相应提高了在海湾地区的威望，还有效弥补了对海湾影响力偏弱的布局结构缺陷，在叙利亚危机中土耳其就和海合会传达出了协同一致反对巴沙尔的声音，拉近了世俗制的土耳其与君主制海湾阿拉国家的政治情感距离。^② 对于海湾地区传统强国伊朗，土耳其一直与其存在着地缘竞争的结构矛盾，因此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冷淡、不睦甚至敌对状态。但近年这一状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土耳其不但与伊朗实现了政治和解，加强了同伊朗政府各渠道的

① 土耳其外交部：《土耳其外交政策概况》（Synopsis of the Turkey Foreign Policy），<http://www.mfa.gov.tr/MFA/ForeignPolicy/Synopsis>，2012-11-01。

② Oleg Svet，“Turkey's ‘Zero Problem’ Foreign Policy: An Untenable Balancing Act”，*NIMEP Insights*，No. 2，2006，pp. 71-78。

接触，提升双方在地区问题上相互协作的档次，还公然采取同它的西方盟友截然相反的立场。2009年6月，内贾德在欧美汹涌浩大的抵制和反对声浪中蝉联总统后，埃尔多安总理第一时间打电话表示祝贺，并邀请他当选后首访土耳其。2010年5月，土耳其联手巴西说服伊朗签署在土耳其境内进行核燃料交换的三方协议，6月，当联合国审议美国提交有关制裁伊朗核开发计划的决议草案时，作为本届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土耳其和巴西成为安理会里仅有的两个投反对票的国家，极大获取了伊朗的好感和信任。土耳其借助外交平台广阔深厚的有利态势，能够与各派势力广泛接触交好的独特优势，以一种超越阵营界限的姿态致力于推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在剧变后的中东外交舞台上往来穿梭，既顾及到中东当事国的情绪，又赢得多国反对派的喝彩和推崇，还获得欧美社会的首肯，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对地区事态的处理能力和对现实权力的掌控能力，也为强势崛起铺就了友善的外部平台。

土耳其强势崛起的战略影响

土耳其强势崛起后，其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处于动态变化中。

（一）消减弱化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意愿

自共和国成立之初土耳其便一直奉行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早在独立初期国父凯末尔就明确宣称，“文明只有一种即西方的现代文明，此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土耳其要实现国强民富，必须加入欧洲大家庭”，从而奠定了土耳其“揭开面纱、穿上西装、走向西方”的基本国策。^①此后土耳其历届政府都坚守“脱亚入欧”的现代化、世俗化国家道路，以进入西方体系、融入欧美社会、步入欧盟（欧共体）成员行列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并为此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二战后，土耳其加入北约集团为西方提供军事基地，开始成为北约在东南欧方向对苏东集团实施前沿部署、侧翼牵制战略的重点对象。欧共体成立后，土耳其将加入欧共体作为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并早在1963年就成为该组织的联系国，开启了屡遭挫折的入盟之路。但直到目前，土耳其依然被欧盟拒之门外，一些自身条件比土耳其差、申请时间比土

^①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7页。

土耳其晚的中东欧国家都已入盟，土耳其依旧以对话伙伴国和候选国的身份在欧盟大门边缘徘徊。欧盟刁难土耳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战略疑虑，从表象上看，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吸纳土耳其入盟会拖累欧洲的发展，而且欧盟内部现有数百万的土耳其移民，入盟后移民的大量涌入不但强烈冲击欧洲就业市场，还可能影响欧盟社会的稳定，从而使欧盟背上更大的包袱。但实际上，欧盟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心，土耳其的经济总量居欧盟第六位，再加上7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0万人规模的武装力量绝对堪称地区翘楚。在欧盟内部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机制中，部分决策权是与成员国人口数量直接衔接。目前，土耳其人口已超过英、法，接近德国，但相比西欧诸国更高的增长率使其人口总量迟早将赶超德国、拔得联盟头筹。^①因此，若土耳其加入欧盟，凭借政治资源和军事实力，再加上占据的地缘和人口优势，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打破欧盟固有的内部权力分配格局。

近年土耳其由于再次被欧盟拒之门外，国内反欧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增，民众的入盟热情持续减弱，加入欧盟的民意支持率也从2002年最高峰值的80%下降到目前的不足50%左右，国内关于“土耳其既是东方国家也是西方国家”的声音愈发强烈。^②加之中东变局的爆发又为土耳其填补权力真空和构建地区秩序提供了绝佳的施展舞台，进一步促使其强化对外政策的东向趋势。事实上，尽管土耳其长期奉行西向战略，实行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世俗化、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刻意淡化伊斯兰文化传统，却始终无法抹去中东国家的鲜明特性。这种社会心态在政治领域的直观反映，就是每当试图获取西方认同的努力碰壁后，总会出现阶段性伊斯兰主义的回潮和外交重心的“战略东移”。土耳其历史上也曾多次上演过在选择欧洲和回归亚洲、是充当欧美“二等跟班”还是争当地区“龙头老大”之间抉择的现象。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盟整体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内部向心力锐减，短期几乎不可能进行外部成员的扩容，因此，土耳其希望尽快完成入盟夙愿的前景渺茫。欧盟在欧债危机中的糟糕表现，也令土耳其对欧洲的崇敬和向往严重下降。中东格局的重组调整又变向推动土耳其的局部坐大，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力蒸蒸日上、大国意识再度觉醒等因素的作用，使赞同重新审视以往对欧

① 李湛军：《土耳其脱亚入欧迢迢路漫》，载《光明日报》2003年1月10日。

② Kemal Koprulu, "Paradigm Shift in Turkey's Foreign Policy",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10, No. 1, 2009, pp. 185 - 201.

战略的群体不断壮大，更多的人开始认为与其继续在西方社会扮演二流角色，不如重塑历史上中东地区超级大国的辉煌。^① 随着土耳其地区崛起激起的疑欧倾向持续发酵，脱离西方、转向东方的新奥斯曼主义将会获得更强的民意支撑，土耳其外交东向趋势也会日益显现和稳固。因此，土耳其的地区崛起虽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凯末尔主义的西向路线，但无疑会极大地消减、钝化土加入欧盟的动力以及民众情感的支持基础。

（二）加速强化地区格局的变革性重组

长期以来，土耳其历任政府都秉承恪守“坐亚望欧”的外交基本方针，注重协同迎合欧洲战略步调，以至有偏激的言论称土耳其是没有战略的国家，追随西方、紧密同欧美联系在一起就是外交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故而，土耳其历来对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周边事务显得漠不关心，与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发展十分有限。加之作为突厥文明代表的土耳其，与分属不同教派和民族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周边邻国存在边境划分、领土争端、水资源分配、意识形态斗争、地区领导权竞争等多重矛盾导致的周边关系紧张，不可避免使其在中东舞台上只能担当“替补演员”的角色，因此，地区前台的主角一直是被阿拉伯、以色列甚至代表波斯文明的伊朗所占据。冷战后，土耳其的独立意识增强，开始纠正向欧美“一边倒”的单向不平衡外交，对中东地区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试图改变在地区格局中次级力量中心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土耳其逐渐形成东西并重、南北兼进的多轴心、全维度、广视域的总体外交部署。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造成自二战后构建起来的中东政治基础版图产生断裂破损，阿拉伯世界传统盟主埃及影响力衰落、海湾大国沙特缺乏领袖气质、伊拉克遭到彻底削弱，伊朗的安全环境却因宿敌萨达姆的灭亡而大为改善。伊战后，伊拉克国内长期被压制的什叶派群体重新得势，进而形成东起伊朗海湾、中经伊拉克、叙利亚、西至黎巴嫩真主党的“什叶派新月带”，加上伊朗通过支持孤立中的 Hamas 而有效介入巴以争端，中东实力对比呈现伊朗空前“被崛起”的奇特格局。伊朗的超预期壮大及不断升级的核问题，使中东群雄围绕地区霸权的争夺、追逐所催生出的——以伊朗、叙利亚同盟为首的强硬团队和以埃及、沙特为代表的温和方

^① Suhanaz Yilmaz, “Ziya Onis. Between Europeanization and Euro - Asianism: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in Turkey During the AKP Era”, *Turkish Studies*, Vol. 10, No. 1, 2009, pp. 7 - 24.

阵两大集团尖锐对立的态势被进一步激化,致使“挺伊”和“反伊”的选边站队斗争取代长期贯穿中东核心的阿以矛盾成为制造地区焦点的新源头。土耳其虽然作为中东唯一可以同时脚踩“挺伊”和“反伊”两派阵营的国家,外交回旋纵深得到大幅扩展,但依然未能改变在中东事务中只是发挥从属辅助和配合牵制作用的传统局面。

然而 2011 年中东剧变的变革风潮促使中东地缘政治状况面临新一轮的颠覆性改组,给土耳其积极谋求地区主导地位,彻底改变自二战以来中东舞台的配角形态,恢复曾经的欧亚大国战略疆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此次剧变中,无论是以伊叙联盟为核心的“亲伊”什叶派势力,还是以海合会为主力的“反伊”逊尼派势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损伤。作为中东第一大战略力量的阿拉伯世界是承受此轮剧变冲击的首要对象,传统大国埃及受困于严重内耗导致地区影响力大打折扣,沙特等海合会国家虽然通过加大整合力度,有效扩展了权势,但不足以根本改变阿拉伯世界整体弱势的状况。伊朗在变局之初收益颇丰,埃及亲美、以和海合会关系亲密的穆巴拉克垮台,埃及新政权的外交政策与旧政权划清界限,显著改善了埃伊两国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长期冷淡的双边关系,伊朗军舰甚至 30 多年来首次被允许通过苏伊士运河。但随着伊朗“铁杆盟友”巴沙尔政权的处境日益艰难,伊朗正负得失的向量值开始朝“归零”发展,一旦巴沙尔倒台,伊朗的战略利益集合甚至有成为“负数”的可能。而以色列则由于埃及友善政权的“变天”以及伊斯兰激进意识的抬头,而身处相对敏感脆弱的困顿境地之中,面临着某种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只好对地区事务采取审慎的热处理、冷加工态度,抱持战略收缩观望的心态。因此,历数此轮地区变局的冲击效果,全面评估中东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和战略格局的分化改组,可以发现中东各地区大国唯独土耳其既未受波及、相反还顺势崛起,权势影响不降反增,甚至升腾出整合重组地区传统格局图谱的架势,实现从边沿外围向区域中心的地缘位置和战略身份跨越。剧变后的中东权力空档为土耳其重返地区舞台的中心平添了充足的底气和信心,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则进一步助推土耳其积蓄已久的领导能量集中爆发。^① 中东变局后,土耳其政府高官旋风式的接连访问利比亚、埃

^① Kemal Koprulu, “Paradigm Shift in Turkey’s Foreign Policy”,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10, No. 1, 2009, pp. 185 – 201.

及、沙特、叙利亚、约旦、伊朗、也门、巴林等几乎所有相关的中东国家，高调介入多国各方纷争斡旋、调停、谈判的核心解决进程中，大力凸显政策制定者和独立参与者的形象，充分展示其更高标准外交战略的魅力，而土耳其政府先于美国和欧盟承认利比亚的反对派政权并明确表示不与巴沙尔合作的政策立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影响到部分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的态度。近期随着叙利亚危机不断升级之势持续蔓延，土耳其的战略地位也逐势递增：首先，土耳其同西方盟友找寻到战略契合点，并借机抬高了自身在西方价值评估天平上的砝码重量；其次，土耳其此举赢得以阿盟内海合会为主流势力的好感、青睐，进一步树立起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第三，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中的立场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伊朗、俄罗斯等地区性竞争力量发挥作用的媒介渠道。土耳其的强势崛起改变了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在地区事务中相对边缘的尴尬境况，介入到从马格里布到黎凡特再到波斯湾多个次区域板块的热点博弈角逐中，如今土耳其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左右地区走势和平衡格局演变的关键力量，埃及总统穆尔西上台不久就提议建立由土耳其、埃及、伊朗、沙特四方组成合作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叙利亚联络小组”机制，伊朗也极为重视土耳其在核谈判、叙利亚局势等问题上的看法立场，主动加强与土耳其的意见交换和对策协商，沙特等海合会国家也非常看重土耳其的影响，在以海合会推动的阿盟近期会议上都坚持邀请土耳其列席，增强相互间的交流协作，在中东有传统战略存在的美欧也极为倚重土耳其所扮演的地区角色，以上事例无疑是各方接受土耳其在地域平衡稳定方面展示决定性和建设性存在的鲜明佐证。

（三）更加凸显正发党政府卓有成效的民主实践发展模式

现代土耳其自诞生之日便将严格的政教分离、世俗民主作为立国之基和强盛之源，即使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正发党政府也极力淡化宗教色彩，坚持多党民主的政治架构，因此人们便将土耳其在保持繁荣稳定的框架下，以坚持世俗化方向和政教分离原则为路线指导，推进传统伊斯兰国家向现代化民主国家过渡的发展经验称为“土耳其模式”。^①随着土耳其的地区强势崛起，正发党所奉行的温和、务实、寻求宗教与世俗间平衡的政策引起中东国

^① 王林聪：《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8期，第20~25页。

家的广泛关注，土耳其的民主模式产生连锁溢出效应。土耳其政府也不失时机地积极向外推销其模式的柔性影响效力，刻意打造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民主表率 and 典范形象。

土耳其民主模式之所以有吸引力，一是土耳其已初步建立较为成熟的政党竞选、选举轮替的民主政体，国内政治环境已形成维持国家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强调维护传统伊斯兰价值观，提倡在尊重宗教自由前提下推动民主改革的意识形态气候。并且，正发党主导的现政府又创造性地推行某种“民主保守党”路线，着眼于国内多重属性的社会客观现实，兼顾历史传统因子和现代文化元素，以非分裂性、非对抗性的思维审视国内外复杂的诸多问题，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协调不同派系势力，既符合世界各国崇尚民主宪政作为国家主体制度的共识，也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更有助于执政根基的稳固和发展活力的释放，推动土耳其的社会结构面貌发生显著的变迁和飞跃。正是土耳其民主制度的运行缔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和社会民生的均衡发展，有效缓解了国内矛盾和消除分歧对立，成为土耳其从容面对地区动荡局势，继续保持国家稳定的制度依靠。二是相比于以色列纯正西式民主的“异端”、伊朗政教合一的原教旨“另类”民主，土耳其的民主模式在情感上更易为中东穆斯林所接受。而同沙特等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相比，已经实现民主有序运转的土耳其无疑更为先进。其三，土耳其已较好解决了国家核心政治生活中军人干政的历史顽疾，军队的活动被全面纳入到正常的政党选举和民主轮替行为系统内，因此对于经历过以军事独裁为基础强人统治的剧变国家，土耳其融合军政斗争痕迹的民主模式更适应“国情”。

尽管土耳其的民主经验为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在伊斯兰群体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参考范例，但许多学者也指出其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并质疑复制土耳其经验的可行性。因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土耳其社会依然处于超越威权、接近完善的“民主前奏”阶段，土耳其的民主体制仍是一个介于民主与独裁之间混合型的过渡政体。而在地区层面，摩洛哥实行的“稳健改革的第三条道路”，也为处于摸索中的国家提供了另一条实现“伊斯兰＋民主”相结合的光明路径，尤其为海湾君主制国家所热衷效仿，同土耳其的民主模式构成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土耳其民主模式软实力的边际影响强度。

综合来看，尽管土耳其的民主模式距离完善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并

且能否被处于剧变转型中的国家所认同、借鉴、仿效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无疑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转型最成功的国家，并且也已在近一轮中东民主化浪潮中成为启发阿拉伯国家探索治理模式的重要精神之源。当前，土耳其东西合璧、多元共处、传统与现代兼容、教俗结合、民主宪政的发展模式成为动荡风暴中的新亮点，必然对众多茫然于如何在本国实践民主制度而又不愿舍弃伊斯兰传统的阿拉伯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借鉴意义，土耳其曾经一度隐遁的“伊斯兰世界民主模板”的示范价值也借助地区强势崛起的“伴生能量”而再次获得提升和延展。

结 语

当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政权更迭之后，土耳其政府灵活调整外交思路，随即以民主权利捍卫者的面貌访问上述三国，表达对新政权的支持，收到良好的效果。继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降为最低档的二等秘书衔级，又在巴勒斯坦入联获取观察员地位和独立建国问题上不顾欧美反感坚定支持巴方，从而赢得阿拉伯世界的赞扬。叙利亚出现危机，土耳其强硬发声，由之前巴沙尔总统的“亲密兄弟”转身成叙利亚反对派的“铁杆盟友”，将叙利亚各反对派势力聚拢于土耳其以扩大参与深度，成为影响叙利亚政治过渡发展进程的核心力量之一。而积极推动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更是震慑叙利亚、俄罗斯、伊朗，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进一步抬高了土耳其在北约和中东的地缘战略位次。土耳其借剧变之机建立起以土耳其为轴心的势力范围，成为地区新秩序的创建者和提供者。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摩根索曾指出：“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由该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家利益是衡量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而国家利益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这就要求主权国家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① 在此次中东变局中，正发党领导的土耳其政府综合考虑、通盘评估多种因素的影响，以灵活、务实的作风精确把握时机借位上位，表现出高超的局势驾驭水平和政策推进能力，不仅继续发展强化了同西方的传统战略关系，还积极参与解决了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驱动地区走势

^①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朝有利自身方向发展的引导能力完全释放，最大化的争取和维护了本国利益，取得令人瞩目的外交成就，真正实现了地区层面的强势崛起。

但是也应该看到，土耳其崛起的“现在进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其外交政策变化的一些负面效应和风险也日渐外溢。首先，中东局势仍然处于尚未明朗的艰难演进阶段，这种相对土耳其有利的地区环境以及未来中东变局的持续发展将对土耳其崛起产生怎样的结果依然存在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其次，伴随着土耳其介入的叙利亚危机开始呈现出胶着状态，土耳其陷入骑虎难下的僵持局面。土耳其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并为此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而叙利亚现政府“坚挺硬抗”却使土耳其无法达到预想目标，甚至有使土耳其前期投资“打水漂”的危险。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不但消磨着土耳其的国力和耐性，还附带出一些令土耳其头痛的棘手难题。目前，涌入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已超过15万，对难民的收容、安置让土耳其社会背负了沉重的包袱。土耳其陈重兵于土叙边境又使针对库尔德人的防备出现松动，库尔德工人党的活动频率随之大幅增加，试图趁乱打劫“大捞一笔”，给本已动荡的局势火上浇油。土耳其应对焦灼中的叙利亚危机无计可施，使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蔓延，更多的人开始对现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从而给执政的正发党造成巨大压力。第三，中东变局后土耳其与部分邻近国家矛盾逐步升级，同其所积极奉行的“零问题”外交格格不入。土耳其和叙利亚摩擦不断，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又使土耳其和伊朗的亲密关系显现紧张的趋势，伊朗总统甚至因为北约在土耳其部署爱国者系统而取消原定的访问计划。土耳其的崛起态势引发地区权力格局松动，导致维系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要素和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迁，土耳其已不具备继续推行“零问题”外交的地区环境。土耳其对巴沙尔政权的立场转变明显与“零问题”外交政策背道而驰，意味着事实上已抛弃“零问题”外交，但土耳其外交调整后的前景仍旧不明朗，甚至短期会使土耳其的活动空间遭受压缩和恶化。第四，完成民选后的埃及穆尔西新政府开始加强地区存在的高外交姿态，力图重新夺回领头羊的宝座，近期埃及在斡旋巴以冲突中的优良表现，就客观反映埃及重建国际威望的努力，而埃及再次加入地区领导行列必然对土耳其不太稳当的“牵头”角色形成竞争。

以目前情况看，土耳其强势崛起的进程尚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距离其渴望和全力追求的国际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综合总体考量，土耳其

已然在地区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与其实力和作用相对等的角色，实现了从增量崛起向质量崛起的超越，达到后奥斯曼时代中东权力谱系的最高峰。土耳其凭借民主政治架构，更具朝气、活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均衡、全面的综合实力，更为多样、广阔的外交平台，必然不会满足于现有成果，将继续扩展和推动已经步入崛起的良好发展势头。

Influences of Turkey' s Forceful Rising on Geo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Ding Gong

Abstracts: Si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Turkey is active in more than one stage of regional diplomacy by good development trend, the unique location advantage, and the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rises to the premier player on regional stage, which has greatly overturned the traditional geopolitics layout, and to some extent changed Turkey' s role in regional affairs from a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situation. Turkey' s forceful rising effects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pattern reorganization, and also enhances the democratic mode for regional influence. Although Turkey is the important winner in the Middle East transformation, there' re still some restrictive elements. Turkey needs to fully grasp the opportunity, and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Key Words: Geopolitics; Middle East Transformation; Turkish Model; Syria Crisis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